

壹、緣起

2016年中秋節過後，一群臺灣人與東南亞女移工齊聚在一民間非政府組織（non-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, NGO）辦公地點，參與「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工作坊」，現場氣氛相當熱鬧，移工眼神充滿了興奮與期待。這是針對東南亞移工開設的影像培力課程，也是一個埋在研究者心中多年的計畫，起源於個人對於東南亞移工及其相關議題的關懷。

自1992年正式引進東南亞移工至今，移工的身影早已成為臺灣社會及生活日常的風景之一。在這個多元族群融合的島嶼，隨著社會結構與生活型態的快速轉變，長期照護及製造業的勞動人力需求不斷攀升，東南亞（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與泰國為主）藍領移工人數逐年遞增，並於2018年10月突破70萬人（勞動部，2018）。未來，東南亞移工人數的增加速度將愈來愈快。一般人將移工視為國際候鳥，是短暫停留的過客，然而，他／她們在臺工作時間少則三年，多則12年，付出與貢獻不亞於臺灣人，且有部分移工與本地人結婚成為新住民，不僅為臺灣注入多元豐富的文化基底，更形成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。

但或許是因為語言、文化上的差異與隔閡，一般國人對於移工的了解相當有限，甚至不知是因為主流媒體的形象建構，抑或是父權意識型態作祟，諸多臺灣民眾對於經濟不利的東南亞籍移工存有刻板印象，不當對待與歧視的情況時有所聞，例如臺灣老字號食品加工廠軟禁移工長達14年（黃良傑，2017）即是真實不堪的社會寫照。東南亞移工無法自由選擇與轉換雇主、工作地點及工作類別，種種政策均凸顯臺灣人權發展的不足，難怪《2016年美國人權報告》（*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16*）針對臺灣的現況指出，來自於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等國的東南亞移工仍有被剝削與不當對待的情形（U.S. Department of State, 2017）。

Spivak曾於訪談中說過，「如果底層的人能說話，那麼，感謝老天，底層的人就不是底層了！」（Chow, 2003, p. 331）。事實上，底層者因為沒有被看見、沒有被重視、沒有說話的管道，無法為自己發聲，只能處於底層的位置。因此，社會上需要一個轉譯與溝通的平台，協助這群被忽視的「他／她者」取得話語

權，當文化、經濟不利的弱勢者開始說話，就有機會被「看見」、被理解，受壓迫以及被邊緣化的現實處境亦得以改善。影片（film）一直被認為是人際間溝通、對話，以及增進彼此相互認識與理解的最佳媒介，它整合影像風格、聲音成為一種具啟發性的語言，和其他的藝術，諸如文學、繪畫、攝影、戲劇一樣，都具有教育性。女性主義者更視電影為挑戰與顛覆既有父權體制的一種武器，若能拍攝與產製以東南亞移工為主角的影片，或可透過影片召喚消費者（觀眾）並達到調解與協商的功能。

這些年來，坊間確實出現了一些以東南亞移工為主題或主角的影片，這些影片大多站在關懷弱勢與呈現其現實處境的立場出發，幫助族群間的理解。然而，拍攝者均為臺灣人、東南亞華僑或新住民，而非東南亞籍移工本身。研究者並非身分本質主義者，亦不想陷入「誰有權力拍攝誰」的主體爭論之中，單純希望從多元文化觀點與影像培力的角度出發，期待能突破現狀，讓移工身兼拍攝者與被拍攝主角，透過「第一人稱」自述方式取得話語權，建構個人的敘事觀點，一來得以產製具多元文化價值與非主流觀點的影音文化資產，促進族群間相互理解，二來可幫助移工在拍片的過程中自我觀看與自我探索，開啟其能動性。

一、「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工作坊」的理念與成立過程

研究者身為影音創作者暨影音教育工作者，長期關注族群與階級差異之下的「他／她者」及其社會處境，自我期許能開辦影音工作坊課程為東南亞移工培力，提供其自我發聲與社會對話的機會。2016年初積極尋求人力、物力與財源，籌備成立「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工作坊」，後獲得公部門的認同與補助，於當年9月底開課。在此之前，一來因為東南亞移工位處邊陲不被重視，再者影音工作坊課程面臨器材與專業人力資源的門檻限制，種種現實條件導致教導東南亞移工影片製作／培力的工作坊，僅曾於2009年，由臺灣國際勞工協會（TIWA）主辦過一次，參與者中有四位移工及兩位臺灣人。

所幸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，需要與母國家人以及朋友聯絡的移工，幾乎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，讓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計畫露出一線曙光。現今的智慧型手機皆具備完整的照相與錄影功能，操作簡易，又十分輕便，可親近性、使用便利性皆大大提升，對於素人學習者而言，可謂學習影音製作的最新利器；另一方